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主编 朴文一
金龟春



黑龙江
朝鲜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古代文化对 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朴文一 金龟春 主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永万

洪成杓

责任校对:张生筠

封面设计:咸成镐

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朴文一 金龟春 主编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16 印张·38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ISBN 7-5389-0896-X/G·210

25.00 元(平)
定价: 30.00 元(精)



作者简介

朴文一

教授，博导，吉林省龙井人，1932年生，1952年毕业于延边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朝鲜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朝鲜简史》（合著）、《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上册 合著）、《迈向21世纪的中国朝鲜族发展方略研究》（主编）等6部，发表《论1231～1260年间蒙丽战争与外交之争》等数十篇论文。





作者简介

金龟春

教授，吉林省龙井人，1931年1952年延边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自任教以来，从事本科、硕士、博士教学工作。

近年来，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省科研项目，著有《世界史》、《中朝日关系史》（上、下）等20余部著作、合及教材，并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绪 论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可能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发生接触和交流,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其接触和交流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并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各国家和民族间的交流发展。

古代中国、朝鲜、日本三国之间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便开始与朝鲜半岛有联系。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与青铜文化传入朝鲜,尤其是在战国后期,大量的燕国、齐国居民不断迁入朝鲜半岛定居,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客观上直接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考古发掘,日本旧石器的许多特征与中国本土的旧石器十分相近,如在日本鹿儿岛遗址中发现了山西许家窖旧石器晚期的狩猎手球。在日本绳纹时代后晚期的“山形县三崎山遗迹里发掘的青铜制小刀,刃部是内弯,其形状与大陆的一样”。^①许多事实又证明中国的稻种和稻作技术也东传日本,于公元前400年顷在日本列岛正式开始稻作。^②但在先秦的漫长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以及地理、交通的尚未开发,这种交流处于间接的、偶然的交流阶段,其方式主要是民间往来。当时中国、朝鲜、

① [日]户泽允则编:《绳纹人时代》,第37页,新泉社,1995年。

② 参见[日]大塚初重、吉村武彦编:《古代史便览》,第66~72页,新人物往来社,1998年。

日本尚未建立起国与国之间的联系。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扩大对外交流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发展,为对外交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逐渐形成了国家。秦汉王朝与朝鲜半岛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交往。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区内的人口迁徙就十分多见。至秦末“陈胜等起义,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①汉代与卫满朝鲜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直接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至东汉时期与三韩的关系密切,对三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汉时期与日本的交往,有《徐福东渡》的传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伍被传》里都有记载。至今日本还保存着徐福之墓。秦汉时期确有大量中国居民迁居日本列岛,成为当地的“归化人”。日本的《日本书纪》、《姓氏录》里都有这方面记述。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元年“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②这些“归化人”的涌入对日本国家的形成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东汉建立后,于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春正月“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于107年(安帝永初元年)“倭奴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这说明也有日本居民较早的流入了大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处于分裂动荡之中,中外关系不像前时期那样全面展开,出现了区域性发展的局面。尽管如此,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往仍在迅速发展。当时高句丽成为

① 《三国志》,卷30,《东夷传》。

② 《日本书纪》,钦明元年8月。

世界上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据史书记载,高句丽使节来访五胡十六国12次、北魏79次、东魏15次、北齐6次、北周1次,共达113次。此间来访东晋南朝的使节也达47次。^①

北魏末年,由于中国北方动荡不已,许多中国人也流亡到高句丽。552年(齐天保3年),北齐文宣帝遣使出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高句丽一次就遣送了5000户。^② 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也与中国南北朝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曾5次遣使来访北朝诸国,33次来访东晋和南朝诸国。^③

这时期,中国与日本先后兴起的邪马台国和大和国的交往也较密切。238年(魏景初2年),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遣使者难升米等至洛阳。当时魏明帝封女王为“亲魏倭王”。此后10年间,两国使者多次来往。东晋、南朝与大和国之间也有过较密切的友好交往,大和国先后10次遣使通聘。这时期,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交往也较多。在日本的中国“归化人”比秦汉时期明显增多。这对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是三国关系迅速发展时期。唐朝廷对外国人采取吸引和保护的政策,如据《通典》记载“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等。这一时期,虽然曾先后出现过隋文帝、隋炀帝征高句丽和唐太宗征高句丽、百济之战。但隋与百济、新罗仍然保持交往,尤其是唐与新罗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在唐安史之乱之时玄宗奔蜀之后,也未中断其关系,新罗遣使者到蜀去拜见玄宗。据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后期的长安和登、莱、

① 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北史》,卷94,《高丽传》。

③ 同①。

密、青、淄、泗、海、楚、扬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留，设有新罗村、新罗坊、新罗院、新罗馆、勾当新罗押衙所等。在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学生最多。于837年，在唐国学中修业的新罗学生有216名。他们有不少人在唐应试中举做官，其中崔致远是最著名的。682年6月新罗立国学，讲授中国五经三史。788年春，依唐科举制“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依学业成绩，合格者分三等授官。^①

隋唐时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隋朝与日本大和国建交，日本先后四次遣使入隋，隋朝也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受到隆重热烈的接待。当时高向玄理等日本很多佛教留学生也随使到隋都深造。唐朝与日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时期日本正式派的遣唐使先后共达12次。^②其规模一般有30名至50名，但有的超过200名。如于653年5月，大化革新之后，改革派分南北两路共241人同时赴唐。其主要成员多数是学识渊博具有较深的汉文知识的人。如粟田真人、山上忆良、藤原清河、吉备真备、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常嗣等都是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文人。有的在入唐后居住很长时间学习唐朝文化，如在日本归化汉人的后裔高向玄理就在中国留学33年。据考证随遣唐使入唐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竟达144名。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改革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代中国僧侣至日本传道的也不少，见于日本史籍的有20余人，其中以鉴真最为有名。他带去佛经34种，创立了日本律宗。他在传教之余，还校勘经典，行医制药，是传播唐文化的先驱者。唐代汉文化对日本影响是巨大的。从7世纪到9世纪末，近300年间，日本接受中国唐文化几乎达到了“全盘唐化”的

① 参见《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元圣王4年。

②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10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程度。到唐代，在东亚汉文化圈形成方面，唐罗、唐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宋、辽、金时期，由于国内各区域性王朝的长期并存，对外关系表现出其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这时期，宋朝与高丽、日本的正式关系基本上停止。宋朝与高丽之间虽然几次互相遣使，但慑于辽、金的军事压力仍没有正式通交。宋与日本也一直都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不过民间交流并没有因而中断，尤其是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发展。宋与高丽之间的民间贸易还是相当频繁，仅就“前往高丽贸易的宋朝商队的规模相当可观，从几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至高丽者达129次，5000余人之众”。^①由于宋币大量流入高丽，所以宋朝廷曾下令禁商持铜钱入高丽。高丽的各种制度多仿效唐制。高丽太祖二年设“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②大盛于宋朝的科举制度，对高丽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也很大。如考试时糊名的作法来源于宋制，高丽朝官在讨论科举制度的改革时，亦曾引证宋儒范仲淹等人的主张。

宋与日本的贸易，虽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本国商船出海。但北宋160余年间，其商船到日本达70多次。南宋时期，随着南宋对外贸易的积极发展和日本镰仓幕府对外政策的松动，中日民间贸易比北宋时期更为活跃。来宋的日本商船有时一年多达40至50艘。宋代中日两国在建筑、印刷、绘画、书法、文学、医学、茶业等方面，也都有广泛的交流。

元朝时期是我国对外关系高度发展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中，朝、日三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元朝与高丽的关系，经历了通

^① 转引自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2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② 《高丽史》，卷76，《百官》1。

交、侵人与反侵人的冲突、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决裂等四个阶段。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元先后发动两次东征，加深了两国的对立局面，始终没有建立正式关系。

虽然如此，元朝与高丽之间的交往还是很频繁的，1218年至1368年，元(含建元前)向高丽的遣使达277次。1232年至1369年，高丽也向元(含建元前)遣使达479次。^①这样频繁的互换遣使，在很多情况下兼行官方贸易。其规模之大惊人，如1284年高丽忠烈王“亲朝”时，其随员竟达1200名，携带“费银六百三十余斤、苧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②当时民间贸易也活跃。1261年在鸭绿江岸开设“互市”，此举促进了民间贸易。元朝时期，元朝与高丽之间除了上层人物经常性的大量接触之外，民间百姓互相迁移现象也剧增。14世纪中叶，高丽移民在辽阳、沈阳一带的竟达数十万。^③同时元朝移民也大量流入高丽境内。1386年12月，明派人到高丽，要高丽“刷已亥年(公元1359年)避寇东来沈阳军民四万余户。”^④可见当年两国移民之多。在元朝时期，尤其是高丽向元朝称臣及结成亲家关系之后，元朝官方文化对高丽的影响是极大的。

虽然元日两国关系处在险恶的状态，但元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通过民间的渠道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其来往很

^① 杨昭全、韩俊光著：《中朝关系简史》，第202~20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② 《高丽史》，卷29，《忠烈王》10年。

^③ [朝]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全史》，卷7，第123页，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1979年。

^④ 《高丽史节要》，卷32，《辛禑王》3，12年。

旺盛,尤其是到元末,频繁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高峰。”^①元朝廷对于日本的民间贸易,采取严密监视与宽大措施相结合的政策。于1277年(至元14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②翌年11月,元朝“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以阿剌罕为宣慰使。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③当时,日本商队的规模也很大。于1279年(至元16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余人,至庆元港口,哈喇歹谋知其无他,言于行,与交易而遣之”。^④元代僧侣的来往也不亚于宋代。随着日本禅宗的发展,来华求学的日本僧人数量也激增。仅就在史籍上留下名字的有220人之多,有时在一个寺院参禅的日本僧人竟达32人。^⑤这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发展。当年,元朝国使、禅僧一山一宁对日本宗教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于1299年到日本,余生留居日本传教,以自己的高风硕德和博学多才,深受日本各界的尊敬。于1313年(正和2年)受后宇多上皇之邀入居京都南禅寺,成为一山派禅宗的开山祖,死后封为国师。日本著名的朱子学者雪村友梅、虎关师谏、梦窗疎石等都受过一山一宁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流总的趋向是保守,直到鸦片战争前,才开始有了明显的扩大和变化。这一时期与李氏朝鲜王朝的关系虽然有时出现一些摩擦,但总体上看还是正常的,仍然维持传统的亲密关系。明建文帝执政后,朝鲜每年平均六次向明朝廷

① [日]中村新太郎:《日本与中国的二千年》,第368页,东邦出版社,昭和53年。

② 《元史》,卷208,《日本传》。

③ 《元史》,卷10,《世祖本纪》第10。

④ 《元史》,卷132,《哈喇得传》,列传第19。

⑤ 参见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25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派使节。^①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千秋使的四次固定使节外,还有谢恩、进贺、陈慰之类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明,甚至“率无常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②从而促进了明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清代中朝关系,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不仅基本上沿袭明朝,还比前期更为正常化、制度化。在清朝,朝鲜使臣的班行、座次又有提高,位居亲王以下,各国使臣之上。他们在北京参加重大庆典,常受皇帝的接见、赐宴、赐酒、视同内臣,为各国使团所不及。使行的频率,正显示两国关系亲密的程度。朝鲜使团来清的次数,居各国之冠。朝鲜使团在清朝的待遇比明朝高。明朝严格限制使团在北京的驻留期限,只有40天。清朝无时间限制,一般留60天左右。又有更多的行动自由。除公事外,还可以以私人身份接触中国官员、学者,游览书肆及名胜古迹。^③清代中朝之间的边境民间贸易也较活跃。在鸭绿江中江、图们江庆源和会宁增开互市,促进边境民间贸易。明清时期两国学者也一直往来不断。

明清时期与日本的关系,由于明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的加剧,明朝采取海禁政策,尤其是到16世纪末,由于日本丰臣秀吉发动长达7年之久的侵略朝鲜的战争和德川幕府执行的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建立关系。但是,两国的形势处于较稳定的时期,变通的官方勘合贸易,还是没有中断过。如自1401年至1549年的150年间,日本室町幕府的正式遣明船先后19次开进宁波港。民间往来,尤其以中国商船为纽带的中日经济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到明末,民间贸易继续发展。日方容

① 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9,第320~321页。

② 《殊域周咨录》,卷1,《朝鲜》。

③ 参见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3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许中国商船开进长崎港,有的年份开进长崎港的中国商船竟达70~80艘。在清朝海禁期间,每年平均也有30余艘船只往来于两国之间。这些官方和民间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明清时期与日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地处东北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朝、中日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很频繁的,具有很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流的悠久性。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与朝、日之间的交往,都可追溯到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上已有“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倭属燕”的记载。

第二,交流的广泛性。其接触和交流的领域是广泛的,是广义文化的交流,它包蕴众多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全方位的交流。

第三,交流的连续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触与交流曾出现过频度之差,甚至出现间断现象。但从整体上说,接触和交流仍是主流,间断是支流,是暂时的现象,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不能改变三国的传统关系。

第四,交流的直接性。其接触与交流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相互转变,但总的看,直接交往是交流的主要方面,是主流。

第五,交流渠道的多样性。其接触与交流,不仅通过官方和民间的渠道进行,还通过贸易往来、互派使节、“朝贡”、寺院交流、派遣留学生等多种形式进行。

第六,交流规模的宏大也是其特点之一。官方接触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互相派遣使节。使节的规模,尤其是历代朝鲜使节的规模是最大的,一般有二三十名,多者甚至竟达上百名。

上述这些情况是在当时中国与别的国家的交往关系中很少看到的特点。

在历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在其交流圈内是否形成一个中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精神支柱，至唐代中国已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韩国中、朝、日关系史专家全海宗博士指出：“中国人的中华主义不单纯基于民族的优越性，而结合于文化的优越性，这就是它的特色。事实上中国的文化是从公元前 15 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经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统一时期，已形成相当高水平的文化。无论看国家的体制，还是文化的水平，比周边的诸民族优越这是事实。”^①历史上中国的哲学思想、儒教思想、程朱理学、中央集权的官吏制度、先进发达的科技发明和成果，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欲居九夷”。在《三国志》里：“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说明当时周边民族和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受容程度。

第二，地理、风土的共同性也是交流频繁的很重要的条件。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由华北过辽宁、吉林入朝鲜平安道或咸镜北道地区；另一条是陆海兼路，由山东半岛抵辽东，再沿海岸至朝鲜海岸；第三条是海路，直接渡海至朝鲜的路线。海路从山东威海到朝鲜海州仅相隔 360 公里的距离。中国与日本虽然只有海上联系，但其相隔距离也很近，

^① [韩]全海宗著：《韩国与中国》，第 106 页，知识产业社，1979 年。

最短距离(自上海至长崎)只有 650 公里。再看气候条件,三国都是属于季节风地带,这为三国之间的海上交往提供了方便条件。渤海王国曾与日本的海上交往是比较频繁的,它主要善于利用季节风适时起程,适时返程。

第三,文化圈的共同性又是频繁交流的重要因素。文化圈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的传播有很重要的影响。同质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异质性起到不少阻碍作用。我们在历史上曾看到游牧民族文化在开始的接触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冲突力和破坏性。中、朝、日三国曾在历史上都是属于农耕文化圈和东亚汉文化圈范畴,开展交流具有有利的条件。

第四,社会发展水平的接近性也是频繁交流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交流的活力深受它的国家基本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所制约,同时也受周边国家环境制约。在历史上,中、朝、日三国发展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又有很多是接近的,尤其是到后来更是如此。三国社会发展的接近性便成为产生交流的共同愿望和可能条件。

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应注意研究其交流的规律性。我们认为其规律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它的必然性,是从高处往低处的传播与交流,是先进的对后进的影响过程,而不是什么人为的行为过程。这是一般情况下正常性交流的普遍规律。

二是它的互补性,是双向交流,互相影响。我们在研究中既要肯定中国文化对朝鲜、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也要承认对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是它的创造性,传播当然有模仿式的传播,但大量的的是结合本国的实际融合的传播、创造性的传播,是发展的传播。

另外,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古代文化传播与交流过

程中强迫性、被迫性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以天朝大国自居，把中外关系固定为君臣关系，在本来正常的中外文化传播中播进了强迫性因素，影响了正常性交流。我们应该具体分析正常交流与强迫交流的区别。

我国对三国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是悠久的，中国正史中的《东夷传》是最早记录三国交流的典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建国以后，我们的前辈周一良、张政烺等学者在这一领域里做了许多拓荒耕耘的研究。70年代以后，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出版了几部资料汇编、专著和论文集。但仍有许多不足，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以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研究中、朝、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巩固发展中、朝、日三国的传统友谊提供借鉴和启迪。尤其是展望21世纪，对它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跨世纪的战略意义。